

环境政治学译丛

# 绿色政治思想

[英]安德鲁·多布森 著  
邹庆治 译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治学译丛  
Environ-Politics

# 绿色政治思想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英]安德鲁·多布森 著  
    郇庆治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本书对生态政治观念和绿色运动目标及战略进行了清晰而富有启发的思考。在该书经过两次修订后的第三版中,通过对生态主义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激进与改革主义的绿色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的系统分析,作者明确地主张,生态主义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色政治思想/(英)多布森著;郇庆治译. —济南:  
—2版.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5  
书名原文:Green Political Thought  
ISBN 978-7-5607-2907-7

I. 绿... II. ①多... ②郇... III. 生态环境-政治学  
IV. ①D0-05②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320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1000毫米 1/16·15.75印张 233千字

2012年5月第2版 2012年5月第3次印刷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 总 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形成中的诸多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



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作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的交流与分享。这其中一个基础性的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等西方



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一统一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共12册)是自2005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的。2005年翻译出版了《绿色政治思想》(安德鲁·多布森)、《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戴维·佩珀)、《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克里斯·卢茨)和《欧洲执政绿党》(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2008年翻译出版了《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默里·布克金)、《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拉·萨卡)、《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和《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约翰·德赖泽克)。2012年翻译出版了《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罗宾·艾克斯利)、《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和公民参与》(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克布)和《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罗尼·利普舒茨)。之所以选择这些著作,一方面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为当代环境政治著述中的经典性作品或“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别展现了“环境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环境政治学整体或某一主要理论与实践流派的最新概貌。

当然,如果没有大量研究基金、学术机构和国内外同行所提供的帮助与鼓励,《环境政治学译丛》在最近几年内的连续编译出版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笔者要特别感谢“中欧高教合作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欧盟—中国研究中心项目、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09YJA710046)和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等所提供的主要财政资助。同时,在本译丛的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安德鲁·多布森、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戴维·佩珀、托马斯·波古特克、克里斯·卢茨、萨拉·萨卡、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约翰·德赖泽克、罗宾·艾克斯利、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马丁·耶内克和罗尼·利普舒茨等提供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他们为各自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了专门的前言,而且萨拉·萨卡先生还对自己的著作作了一些文献资料性的补充与完善。

同样重要的是,我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刘颖博士、徐凯博士、张淑兰教授、李宏博士、蔺雪春博士、郭晨星博士、侯艳芳博士、郭志俊博士、杨晓燕博士、李慧明博士和博士候选人李昕蕾女士等,他们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先后承担了本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再次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对《环境政治学译丛》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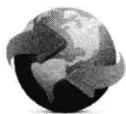
2012年4月于北京大学

## 译者说明

安德鲁·多布森教授的《绿色政治思想》(*Green Political Thought*)一书,不仅确立了他在欧美生态政治理论研究领域中最权威学者之一的地位,而且已经成为生态政治理论两大流派之一——“生态自治主义”的经典之作。它在1990年首版后不久,就在1991年、1992年和1994年3次重印发行,并随后在1998年和2000年出版了它的第二版和第三版,成为环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难得的学术畅销书。本书的主要特色或学术贡献在于,作者试图阐明生态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比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独立政治意识形态地位;更富有挑战性的是,他坚持认为,这样一种有着独特的社会现实描述与未来社会规划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根本不同于甚至更难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环境保护主义的观念与实践相融合。在经过两次修订后的第三版中,作者不仅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即生态主义是一种不同于21世纪初其他竞争性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立政治理论,而且作了对于理解他个人学术观点和西方环境政治过去十年来发展都很重要的补充完善。

译者与安德鲁·多布森教授的学术联系开始于1996年底,此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交往。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我们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框架下共同申请完成了一个合作研究课题“90年代的欧洲绿党:跨国比较研究”。而我们之间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个人会面,竟是2002年9月在美国政治学会的波士顿年会。在那次会议上,他应





邀主持一个关于西方生态政治理论最新进展的小组讨论,而我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列席了相关研讨。在这些交往过程中,他的学者风度、机敏睿智、热情豪爽和对年轻学者的关爱,都给译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应该说,除了本丛书在翻译体例上的统一要求,比如将参考文献改为国内读者比较习惯的章末注方式,译者的唯一愿望就是忠实地译出原作的內容。而且,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从最初的版权谈判到正文译校中遇到的问题,安德鲁·多布森教授都给予了热情而及时的帮助。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太多的理论流派、专业术语、运动事件以及人名地名,由于本书作为政治理论著作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思辨色彩,当然最终是由于译者学识与语言水平上的限制,译者在许多情况下只能采取较为保守的“意译”和“直译”的办法。译者的托辞或“理由”是,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一些原作的文采与生动,但却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低级的误读与错译。

另外,译者要感谢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生杨晓燕、李萍和张云,她们在济南的夏日里精心校对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建议,而对于书稿中很可能依然存在的诸多谬误之处,则理应由译者负责。

译者

2004年7月于山东大学

## 中译版前言

今天,我拿起一份英国的全国性报纸之一《卫报》并读到了以下头版新闻:“有毒烟雾笼罩北京。”(2004年10月11日)这一文章描述的是,尽管空气质量近年来有所提高,成千上万的北京居民正被要求留在室内以回避时常围绕城市的有毒烟雾。很明显,烟雾的直接原因是用于这个城市中数量迅速增加的轿车的低标准汽油。自1998年以来,北京道路上的轿车数量已经翻番,达到了200万辆,预计到2008年时将会达到300万辆。它们使用的汽油包含着大量的硫,而依据中国国家环保局的说法,这种汽油造成了这个国家中大约79%的烟雾。

依据世界银行的看法,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这种污染引起了极其严重的人类健康难题,使呼吸道疾病成为中国导致死亡的最普遍性原因。支气管炎、肺纤维化、肺结核和肺癌等的发生率已经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难题是遵循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它将经济增长置于最优先地位,而将环境保护置于远为次要的地位——的后果。在笔者生活的英国,我可以看到19世纪时伦敦的照片,它们看起来很像今日北京糟糕时的景象:同样的黄白的光线,同样的朦胧的建筑和同样的淡薄的太阳。伦敦现在至少在这方面已经比150年前清洁得多,虽然在夏天的个别日子里走在街道上依然有一种特别不舒适感,但总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善。英国的城市曾经因为同样的原因不适宜人们居住,就像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今天有时令人感到不适一样:它们受到一种依赖化石燃料的经济的推动,而很少考虑减轻这种依赖可能会引起的破坏性后果。



那么,这是唯一可能的发展道路吗?中国注定要重犯其他的所谓“发达国家”已经犯过的错误吗?本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运动——即“绿色运动”,它在过去40年中在那些相信有着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国家,比如英国具有不断增加的重要性。这一运动相信,还存在不同于被所谓发达国家遵循并正被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复制的、同样可以导致繁荣与幸福生活的其他道路。更具体地说,本书是关于那些推动了这一时期运动发展的观念的。笔者在本书中主张,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新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对此,笔者称之为“生态主义”。至少在西方,我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有一种对环境看法,但它们都没有将环境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核心。而生态主义却做到了。生态主义提供了一种对环境破坏与退化原因以及导致一个十分不同于我们之中的很多人目前所生活的社会的选择性发展道路的非常明确的分析。生态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声称我们正在遵循一种将引导地球上的大部分人类和非人种群走向苦难而不是满足的发展道路。政治生态学家主张,我们生活方式的实质性地改变——政治地、社会地和经济地——是必需的,如果我们要想个体地和集体地实现我们的潜能。

本书是基于一种西方背景而写的,它所提供的事例几乎都来自所谓的发达世界。因而,初看起来也许是,它对于一个如此不同于笔者所在的国家,比如中国只有着有限的借鉴意义。但是,正如我在本序言开始举出的例子所表明的,我们也有着大量共同的历史经历。每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都会采取一种具体的形式,以便与它本身所面临的文化前提相协调。在笔者看来,“生态主义”的确包涵着很多对于当今中国密切相关的方面,但中国将动员她自己所拥有的丰富历史与文化经验,从而以一种在中国背景下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消化吸收这种意识形态。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式产生某些影响,我将非常高兴和欣慰。

安德鲁·多布森  
2004年10月于开放大学

## 第三版前言

在本书第二版的前言中,我曾经提到了有关它所论及的主题即生态主义的著述在第一版出版后的爆炸性增长。这一增长趋势并没有显现出减缓的迹象,相反,它正变得更加迅猛与强烈。这一领域著述的水准是如此之高,因而,我们必须在第二版前言中列举的专著性论述名单中增加某些篇幅较长的出色思考。比如,古丁(R. Goodin)的著作(《绿色政治理论》1992年版)、海瓦德(T. Hayward)的著作(《生态思想导论》1995年版和《政治理论和生态价值》1998年版)、德赖泽克(J. Dryzek)的著作(《地球政治学:环境议程》1997年版)、史密斯(M. Smith)的著作(《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公民权》1998年版)和巴里(J. Barry)的著作(《重新思考绿色政治》1999年版)等等。这些著作构成了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环境政治理论化“第二波”的一部分。“第一波”致力于解释和分析环境政治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而本书的第一版主要属于那一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第二波”的论著已经更加专注于政治理论而不是意识形态,而且采取了一种批判性探索环境政治与政治理论中持久性主题和概念,比如民主、公正和公民权等的形式。“第二波”的某些影响可以在本书即《绿色政治思想》的第三版中找到,我在第四章中增加了一个题为“民主与权威主义”的部分,并在第五章中提到了社会公正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第五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通过扩大它所论述的范围,即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而且包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我对学者们表现出的



对生态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兴趣、对从事这一领域的某些杰出学者的比较性研究都作出了回应。总之,我利用了这次难得机会来强化本书的主题:生态主义是一种独立意义上的政治理论,不同于它在 21 世纪初竞争着的其他政治理论。我在第二版结论部分中确定并讨论的对生态主义发展的同情性或不太同情性的回应仍然在持续。现在就像以前一样,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强烈信念:生态主义的目标可以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实现。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并且,我已再次重写了结论部分来努力解释其中的原因。我很高兴地看到,致力于环境政治的学术群体是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和不断扩大的,而且,与他们一起工作总是一件智力的和社会的乐事。尤其令人鼓舞的是,“绿色领域”之外的学者开始应对环境政治理论所揭示的智力挑战。像从前一样,我想感谢那些参与了这一激情对话从而影响到了本书中学术观点的各位同仁。我还要感谢罗特里奇出版社的编辑马克·凯瓦纳格(Mark Kavanagh),他邀请了我从事本书的修订工作。最后,我还要感谢基尔(Keele)大学的建筑合约人,他无意间提供了米霍·苏嘎纳米(Miho Suganami)的本书封面照片的素材。

安德鲁·多布森  
1999 年 8 月于基尔大学

## 第二版前言

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不久,我才认识到了自己在其中努力的价值所在。密涅瓦的猫头鹰的到来受到了世界各地同事们对《绿色政治思想》的广泛阅读的激励,这种集体的力量使我明白,确保生态主义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类别中的独立地位是我初步努力中的首要目标。政治意识形态的介绍性教科书长期以来已经有了许多,但生态主义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据我所知,1989年时,这类教科书中还没有任何一本包含着关于生态政治思想的章节,但现在已经有一些。比如,巴尔(T. Ball)和达格(R. Dagger)的著作(《政治意识形态与民主理想》1991年)、利奇(R. Leach)的著作(《英国政治意识形态》1991年)、海伍德(A. Heywood)的著作(《政治意识形态导论》1992年)、麦克雷迪斯(R. Macridis)的著作(《当代政治意识形态:运动与体制》1992年)、文森特(A. Vincent)的著作(《现代政治意识形态》1992年)、多布森的“生态主义”(参见《当代政治意识形态》1993年版)和肯尼(M. Kenny)的“生态主义”(参见《政治意识形态导论》1994年)等等。我希望,已经实现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使第二版的论述焦点更加敏锐,而且,我力图(尤其在导言部分)更加坚定地,在政治意识形态理论中和在评述比如前文已经提及文献的背景下来展示自己的生态主义观点。这一侧重也使得我能够进一步探究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区别,而它现在是环境政治争论中的重要内容。

有关环境政治著述的绝大部分出现在过去五年中,而追踪其发展



过程是一件耗时的事情。我惊喜地看到,这一通常十分复杂的工作所要求的是我从前观点的调整而不是完全的重建(当然,我又何以能够谈一些不同的东西呢)。尽管如此,我已经更新了相关的评论与事例,并对那些遇到的挑战做出了回应。

因而,本书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第一章的内容已经部分是由于大量评论者给予的批评性分析而重新推敲。我希望,第二章的一些论点已经变得比第一版时更加清晰,并且,我在第三章中对可持续社会持一种比1989年时更加宽容的(但同时也原则性更强的)观点。我已更新了第四章,而且增加了一个关于直接行动的较短部分。另外,我希望,第五章关于社会主义的部分受益于与这一相关论述增长最快领域之一,即生态社会主义的联系。在我看来,生态女权主义目前已经比1989年时更加明显地两极化发展,我试图在第五章中对生态女权主义的重新论述中反映这一点。最后,现实中有一个新兴起的和重要的趋于下述观点的转向:尽管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在概念上是有所区别的,但它们在最为重要的问题即目标是保护环境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一争论构成了本书结论部分的主题。

多少有些陈腐但却是事实的是,如果没有那些阅读(或通过其他方式有所借鉴)本书第一版并告知我其中错误之处的同事们的帮助,《绿色政治思想》的第二版将是不可能的。尽管只提及他们中少数人的名字可能会惹人反感,但我还是要这样做。他们包括:沃特·阿切特伯格(Wouter Achterberg)、艾德里安·阿特金森(Adrian Atkinson)、约翰·巴里(John Barry)、泰德·本顿(Ted Benton)、珍内特·比尔(Janet Biehl)、默里·布金(Murray Bookchin)、安娜·布拉姆威尔(Anna Bramwell)、阿兰·卡特(Alan Carter)、布赖恩·陶赫蒂(Brian Doherty)、约翰·德赖泽克(John Dryzek)、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朱迪·埃文思(Judy Evans)、鲍伯·古丁(Bob Goodin)、皮特·海(Peter Hay)、蒂姆·海瓦德(Tim Hayward)、迈克·肯尼(Mike Kenny)、基考克·李(Keekok Lee)、保罗·卢卡迪(Paul Lucardie)、玛丽·梅洛(Mary Mellor)、戴维·佩珀(David Pepper)、迪克·理查森



(Dick Richardson)、迈克·萨沃德(Mike Saward)、简·范德斯特拉登(Jan van der Straaten)、安德鲁·文森特(Andrew Vincent)、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卡罗琳·温特吉尔(Caroline Wintersgill)、马塞尔·威森伯格(Marcel Wissenburg)和斯蒂芬·扬(Stephen Young)。

看着这一名单我才意识到,我在1989年前只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个。因而,或许《绿色政治思想》的最好副产品是我得以幸运地结识了这些杰出的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我的朋友。这一名单中的卡罗琳·温特吉尔不是学者,而是罗特里奇出版社的本书的编辑。我应该感谢卡罗琳,是她劝服我从事准备本书第二版的有益经历并一直作为我工作的不厌其烦的建议征询者。我希望,本书第二版能够回馈她的执着和那些试图启迪我智力的同事们所做的努力。

安德鲁·多布森

1995年于基尔大学



## 第一版志谢

本书起源于由工人教育协会(WEA)1987年在牛津举行的一个关于绿色政治的课程,而我始于那里的这一学习过程后来在基尔大学中的两个连续性学习后工业政治的学生小组中得以继续。我应该感谢所有那些参加这些课程的成员所表现出的热情和他们并非易事地理解我学术观点的艰苦努力。

我从与戴维·海(David Hay)、安娜·布拉姆威尔(Anna Bramwell)、戴维·佩珀(David Pepper)、乔恩·卡彭特(Jon Carpenter)、吉恩·兰伯特(Jean Lambert)、蒂姆·安德鲁斯(Tim Andrewes)、安德鲁·西姆斯(Andrew Simms)的谈话中受益匪浅,而蒂姆·奥里奥丹(Tim O'Riordan)和沃里克·福克斯(Warwick Fox)在通信中给予了我有价值的指导。同样,出版者的各种匿名审阅人指出了初稿中存在着的弱点,而我尽最大努力吸取了他们的有益建议。在这方面,我的编辑戈登·史密斯(Gordon Smith)自始至终提供了大量令人感激的帮助和适时的鼓励。我还应当感谢我的兄弟迈克·多布森(Mike Dobson),他不仅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环境状况的科技文章,而且他为了里约玛赞(Rio Mazan)计划在厄瓜多尔热带雾林中从事的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实地考察的难得机会。与此同时,如果没有来自波琳·韦斯顿(Pauline Weston)和露丝·贝蒂(Ruth Battye)无私给予的、宝贵的秘书性帮助,我也很难完成这一计划。

然而,我最诚挚的谢意应该给予我的同事玛格丽特·卡诺万